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诞生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成为新中国的国号，响彻世界。

很多人不知道，在确定这一国号之前，曾经有过一番争议，特别是围绕使用简称讨论激烈。本文所讲述的，就是国号背后的故事。

## 早期的建国构想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建立新中国作为奋斗目标。二大时，面对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党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构想。到了1931年，囿于当时的情形，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显然具有鲜明的苏联色彩。

抗日战争期间，民族矛盾突显。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指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和任务下做出的一种调整，但仍没有放弃“苏维埃”的称谓。1936年8月，为适应全民族抗战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毛泽东强调：“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由此可见，“民主”与“共和”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国的重要价值取向。

## 黄炎培、张志让提出条陈

1948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颁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开启了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序幕，得到各方面积极回应。毛泽东在8月1日给各民主党派的复电中，提出要“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一段时间，一直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



开幕。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国家称号关乎国体，兹事体大。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的一些代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提出了不同意见。黄炎培、张志让专门给新政协筹备会写了一个《提议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的条陈。

黄炎培、张志让的意见引起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视。秘书长李维汉6月19日批示“抄送主任、副主任委员与各组长”。

## 张奚若为新中国起名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分六个小组承担相关的筹备工作。其中，第四小组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董必武任组长，黄炎培任副组长。1949年6月18日，第四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广泛交换意见后，推举以张志让为召集人的7人委员会准备讨论提纲。

6月23日，起草提纲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董必武开场提出讨论的要点，首先就是“对国家名称，有不同意见”。在发言中，张东荪认为，国家名称与制度比起来，制度更重要。林励儒提出，国家名称无论是用哪一个，皆简称“中华民国”，故有把国家性质表明的必要。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名字太长，说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二字就可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

他认为这个名称虽长，解释起来容易明白。“是共和而非专制，民主而非君主，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为慎重起见，此次会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主国(皆简称：中华民国)”，并列提出来，供代表们讨论。

8月17日，第四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了《政府组织法初步草案》，提交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审议。从这次会议的档案资料上可知，“新政治协商会议”已改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后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笔者注)”，国家名称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的改变应该在当年8月份。薄一波曾回忆说：“1949年8月14日，我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决定：一、新政协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国号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三、9月10日正式开会(后因文件起草未完成，改为9月21日)。”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原则通过政协组织法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和《共同纲领》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

在提交全体会议的文件里，新的国名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董必武在9月22日全体会议上，就政府组织法草案拟作说明。总纲的第一个问题是国家名称，他说：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演讲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张奚

若以为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 要不要简称“中华民国”

对国号争议最大的是简称问题。正如黄炎培、张志让的条陈中所指出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中华民国”这个称谓。在政协讨论时，一些代表提出，应该将简称写入《共同纲领》。这是个习惯称谓，写进纲领可以照顾到统一战线中的各个组织。但更多代表认为，“中华民国”代表旧中国的统治，新中国应是新民主主义的，反对将“中华民国”简称写入《共同纲领》。鉴于不能形成统一意见，只有提交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

新政协筹备会已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名称。然而，在提交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的国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六个字。是否应去掉原稿中的这句“简称中华民国”呢？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后，尽管会务繁重，周恩来还是于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宴会，邀请20多位政协代表参加。他们大多是70岁上下的老者。

宴会之前，周恩来先讲了开场白。他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作“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

黄炎培首先发言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三年之后再去掉，并无不可。

辛亥革命老人、72岁的何香凝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

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随后发言的周善培是位前清进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他态度坚决地反对用简称，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81岁高龄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听不懂北方话，由其秘书司徒丙鹤陪同参加新政协。这次，也由司徒丙鹤把别人的发言译给他听。听到此，司徒美堂猛地站起来，要求发言。宴会厅里静下来了，只听他说：我也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那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接着，他又激动地说：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作“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慷慨激昂，掷地有声。言毕，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马寅初立即表示赞同，并说：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张澜、陈叔通也表示反对用简称。当天发言者18人，有16人主张不用简称。最后，周恩来表示，要把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报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1949年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自此，新中国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

(据《人民政协报》)

## 经历九死一生，从不计较名利

# 抗美援朝老兵，回乡当了农民

从湖北省巴东县县城坐车绕着山路行驶一个半小时后，记者来到官渡口观音岩村村民黄厚勇家中。黄厚勇是抗美援朝老兵黄忠茂的三儿子，老人跟他生活在一起。

没有老照片、没有旧军装，也找不到立功证书，这家人似乎跟“抗美援朝”没什么关联。“家中曾遭遇大火，很多东西都烧没了，前几年还能看到一两张老照片，这两年也都找不到了。”黄厚勇说。

今年91岁的黄忠茂，喜欢坐在自家的小院里晒太阳。他早些年便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现在愈发行动不便。

“战场寒寒，父亲的膝盖落下

病根，这几年变得更严重了。”黄厚勇说。

黄忠茂是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紧接着便随部队开赴东北，参加垦荒。“把枪、炮都放进仓库，种出来的玉米、黄豆等交给政府。”他说。

时光流逝，老物件慢慢遗失，但记忆却并未抹去。靠着儿子大声翻译，黄忠茂讲起了自己记忆中的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124师的一名战士，黄忠茂随部队入朝参战。

1950年10月25日，黄草岭战役打响。这是42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的第一仗，也是黄忠茂内心深处轻易不敢触及的回忆。

“美军飞机像苍蝇一样在我们头上轰炸扫射，扔下的炮弹就在身边爆炸。我们被炮弹炸起的土埋起来，有尺把深，然后又被战友们再挖出来。很多战友被炸得面目全非。多年来，我一直不忍心回想。”黄忠茂哽咽道，那时早忘了害怕，只知道自己也还活着。

“死守阵地，决不能后退一寸，是我们唯一的信念。”黄忠茂说。

在一次执行护送战略物资的任务中，黄忠茂所在的运输车队被敌人发现。敌人释放信号枪、点燃车

队周围的枯草、树叶。黑夜中，美军轰炸机循着信号飞来。

“汽车周围的火光势必引来敌机精准轰炸，运输车队恐怕保不住。来不及多想，我跳下车就用衣服去扑火。”黄忠茂说。

同行的战友看见火光中有个人影晃动，以为是敌人，拿起枪询问：“你是谁？”

“是我，黄忠茂。”黄忠茂立刻回答道。

“由于火被扑灭，敌机在我们头顶上打了几个转转，没找到目标，没炸着我们的汽车。战略物资被安全运送到前线。”黄忠茂说，因为成功保住满载的运输车队，他

荣立二等功。

1956年，黄忠茂转业回乡。“我不识字，便选择转业。”黄忠茂回忆说，当时国家号召他们当好国家的支柱，建设农村。

黄忠茂重新回到生养他的那片土地，拿起锄头，当起了农民。

“带领乡亲们开垦土地，看着周围人都有地种、日子越过越红火，我非常开心。”老人的言语中饱含着对土地的深情。

新中国成立前，黄忠茂当过长工，也曾被捆走当壮丁，跟当时所有的农民一样，他一直梦想着有一块自己的田地、能安稳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儿时听父亲讲战斗故事，我竟觉得‘好玩儿’。后来才慢慢理解，父亲九死一生是多么不容易。我经常教育儿女向他们的爷爷学习，希望孩子们长大后能建功军营、保卫祖国。”黄厚勇说。

(据新华社)